

《文心雕龙》“文笔”说辨析

——附论“集部”之分类沿革

詹杭伦

本文辨析六朝以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为中心的“文笔”观念,主张把“文笔”的讨论置于中国目录学“集部”沿革的背景之上。本文认为,刘勰与颜延之、萧绎在对“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概念体认上基本一致,刘勰与颜延之的分歧建构在是否“宗经”之上,刘勰与萧绎的分歧建构在是否“重文轻笔”之上;并且,六朝的“文笔”观念对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杂文试”颇有影响。

以刘勰《文心雕龙》“文笔”说为中心的六朝“文笔”观念,得到近现代学者的关注,已经讨论了将近一百年。各家主要的意见,可以参考冯源的《二十世纪“文笔”说研究述评》一文。检讨近百年以来关于“文笔”说的学术争议,可以知道,各家见解分歧颇大,围绕《文心雕龙》“文笔说”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厘清。20世纪“文笔”说的研究状况无疑还存在不少缺憾,其原因正如冯源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是由于“文笔之辨,缴绕纠缠”,因而专门对之研究的学者并不是很多;另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大多以西方文学观念来阐释六朝的“文笔”说。而现实情况是,中西两套文论话语并不能在一个逻辑层面准确对接,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有着远非西方文论的语汇和逻辑所能全部表达的丰富内容,完全用西方“纯文学”观念来观照“文笔”说,势必会割裂、遗漏“文笔”说固有的内涵与特色。笔者以为,“文笔”概念分辨不清,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还与研究者未能将“文笔”辨析置于中国目录学“集部”分类沿革背景上有关。有鉴于此,笔者重新检阅有关“文笔”说的基本文献,提出个人的一些见解,以就正于学术界。

一、刘勰与颜延之的“文笔”说

要解析《文心雕龙》的“文笔”说,首先必须厘清的一个概念是:《文心雕龙》之“文”与“文笔”之“文”是两个有联系的但是不能等同的概念。《文心雕龙》之“文”,与陆机《文赋》之“文”、

萧统《昭明文选》之“文”一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相当于“集部”的概念(更广义的概念指文字之“文”),而“文笔”之“文”,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它只是“集部”之中的“有韵”的文类。欲明乎此,我们先引《文心雕龙·总术》篇的论述如下: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果言文^③,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笔曰翰,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六经^④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⑤

笔者将这段话分成以下三部分,逐一解析:

(一)“今之常言”的“今”,牟世金注:“指晋、宋以来。”而“文以足言”,牟氏无注。按,此语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孔子家语》:“孔子闻之,谓子贡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晋为郑伯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小子慎哉。”从文献出处,可以明显看出,“文以足言”之“文”指的是表现言语、形诸文字的文章,它是一个自古而来的广义的概念,也就是《文心雕龙》研究的广义之文,而“文笔”之“文”,只是晋代以来,从广义之“文”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狭义的概念,仅仅指的是“有韵者”,即押韵的作品。

(二)颜延之的意思是说,“笔”这种体裁,是经过文饰的言语,经典是圣人言语的直接记录,所以不属于“笔”,传记是经过文饰的言语,应该属于“笔”类文体。很明显,他的意图是要将经典排除在“笔”类文体的范畴之外。刘勰反驳说,《易》中有《文言》篇,说明经典也是经过文饰的言语,所以经典也应当放在“笔”的范畴之内。王更生认为:“颜延年在文笔以外,又增‘言’类,认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刘勰却又反对这种‘文’、‘笔’、‘言’三分法。”笔者认为,颜延之并没有所谓“言、文、笔”的三分法,因为集部的“文笔”,并不能与经典相等同,他只是企图将“文、笔”与“经”相区隔,把文笔问题仅仅放在“集部”的范围之内来讨论。再看其他的材料,颜延之的确主张“文笔”可以与“经子”相区隔。据《南史·颜延之传》:“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说:‘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勰得臣义,跃得臣酒。’何尚之嘲说:‘谁得卿狂?’答说:‘其狂不可及。’”所谓“勰得臣义”之“义”,有学者解为“指谈论之才”^⑩,这是把“义”字辨识成“清议”之“议”。我认为这里的“义”字如果不用通假之法,恐怕也可以理解为“义理”之“义”,因为“经子”是“义理”之渊藪,颜延之将四位儿子所得自己之学,分别立论,也表明他有把“文笔”之学与“经子”之学相分别的趋向。

(三)刘勰正面阐述他自己的见解,认为经传“出言入笔”,与集部的“笔”有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经传也可以纳入“文笔”的范围来加以讨论。

由上可见,颜延之的观点,其实质意义是,既然经、史、子、集已经分部,那么,再讨论集部的“文笔”问题时,可以不涉及经典;而刘勰的观点,其实质意义是,虽然经、史、子、集已经分部,但是,六经是一切文章的渊藪,因此,在讨论集部的“文笔”问题时,也不可以置经典于不顾,否则容易发生迷失根本、断港绝潢的错误。这与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所说“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立论的基点是完全一致的。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应该明白了,颜延之是从文献分类的观念出发的,主张讨论“文笔”问题应当与经典分离;刘勰是从宗经的观念出发的,主张讨论“文笔”问题,也应该从经传说

起,以便饮水思源,不离根本。由此可见,颜延之与刘勰在“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认知上并无矛盾,只是颜延之站在“文士”的立场上,主张讨论“文笔”应与经典相分离,刘勰则站在“宗经”的立场上,主张讨论“文笔”不能脱离经典。何以说颜延之是基于“文士”的立场,刘勰是基于“宗经”的立场呢?《昭明文选》卷五七录颜延之《阳给事诔》,序云:“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末臣蒙固,侧闻至训,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⑫《宋书·索虏传》载,阳瓚战死,少帝下诏追赠为给事中,“文士颜延之为诔焉”^⑬。这说明时人把颜延之视为“文士”。在南朝宋时代,颜延之和谢灵运并称“颜谢”。“爰逮宋氏,颜谢腾声”(《宋书·谢灵运传》)^⑭。“颜谢重叶以凤采”(《文心雕龙·时序》)^⑮。“爰及江左,称彼颜谢”(裴子野《雕虫论》)^⑯。从这些南朝人的评论可以看出颜延之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而刘勰在《序志》篇中,明确声明:“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惟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⑰这说明刘勰的确是站在“宗经”的立场上论文的。由于“宗经”的需要,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先要列出“文之枢纽”五篇,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然后才按照“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的方案,把其文体论分为文、笔两个部分。其中属于“有韵之文”者,有《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等九篇,属于“文笔夹杂”的有《杂文》、《谐隐》两篇,属于“无韵之笔”者,有《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十篇。这种结构,正是体现了“宗经”的观念。

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引进了“集部”的概念,作为讨论颜延之和刘勰观点的背景基础,因为在颜延之和刘勰的时代,四部分类法已经基本确立,要明白这一点,需要从目录学上“集部”的成立说起。

二、“集部”之分类沿革

“集部”虽然是“文学”的渊藪,但“集部”著录的文献并非全部属于西方的所谓“纯文学”,这要从“文学”概念的出现说起。“文学”一词出现很早,孔子教育弟子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先进》说:“文学:子游、子夏。”皇侃《论语义疏》:“范宁曰:‘文学,谓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学指博学古文。”^⑱根据这样的解释,在先秦孔子时代,文学不过是熟悉古代文献典籍之学,而子游、子夏就是在文献典籍方面有专长的孔门弟子。《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⑲这说明,汉代的文学概念,也不过泛指学术典章文化而言。儒家经师,《史记》有《儒林列传》专门记载,《汉书》等史书因之。大约东汉才开始有专以诗赋文章自名一家的文士,晋范曄的《后汉书》乃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这是文士地位受到重视的一项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致力于诗赋创作的文士愈来愈多,而目录学上文集自成一部,确立四部分类之架构,更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大关键。

(一)“集部”之分类沿革。

集部的分类沿革,梁阮孝绪之《七录序》谈得最为清楚,今引于次:

至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

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疑作伋)、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又于东观及仁寿阁撰集新记,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其后有著述者,袁山松亦录在其书。

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

自时厥后,世相祖述,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朓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大半焉。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爱命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暕,撰其名录。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

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其方内经史,至于术伎,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凡为录。^②

汉刘歆《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图书分为六大类,其中,“诗赋略”著录各家诗赋,宋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承袭“七略”的分类系统,其中《七志》有“文翰志”,《七录》有“文集录”,均属此一类别而加以增广。晋荀勖《中经新簿》首开四部分类之先例,各家文类之作收录在“丁部”,晋李充《晋元帝书目》因而未改,仍称“丁部”。目录学上的这种情形说明,在南朝刘宋之前,四部分类法已经基本确立。至于“集部”名称的确立,实经过宋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直到《隋书·经籍志》三个阶段,始确立“文集录”之名,阮孝绪说:“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③唐人修《隋书·经籍志》,专门收录各家文类作品的类别最终定名为“集部”。《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说:“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④这说明“集部”的分类,渊源于“诗赋略”,至于名之为“集”,则从《七录》“文集录”之名演变而来。

清章学诚说:“荀勖《中经(新簿)》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于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⑤所谓“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意谓梁阮孝绪之“文集录”,已经确立后来“集部”的分类名称和内容。

(二)“集部”与文学之关系。

传统图书分类里的“集部”,其内容驳杂,性质不一,与“文学(纯文学)”的观念颇有差异,不可不加以辨别。学者所撰述的学术专书,通常根据其书之性质归类于经部、史部或子部之

中,专书以外,撰写的其他诗赋、奏疏、书信、序跋或墓志铭等,便归结为一“集”。如任昉《王(俭)文宪集序》说:“昉以笔札见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缀缉遗文,永为世范。所撰《古今集记》、《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②4}同为王俭之作,《古今集记》和《七志》等“为一家言”,既然成为专书而单独流传,便不再收入其别集。章学诚更指出:“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②5}

别集或总集之中,固然有文、笔两类作品,却也不乏经义、传记、论辨之文,就其性质而言,其实也属于经学、史学或子学领域,惟其尚未成专书,所以才编入集中。正如张蓓蓓所说:“集部所收作品虽然多是文学,但并非全属文学。即表奏、书记、碑诔之类,其实本是应用文字,并非纯文学。另外,集中亦常收录作者的短篇论辨、杂说之类,论其性质,多近乎思想而远于文学。某些短文甚至竟是简洁的经史考据。所以‘集部’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文学,有时反与经、史、子相关。同时,经、史、子籍中的若干优美段落,常被后世文学专家选摘出来作为学文范本。”^{②6}但需要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有的文士对于经、史、子阑入文集之中的情况甚为不满。如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记载:“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②7}颜之推所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某些学者学识简陋,思想呆板,不能融会贯通经、史、子、集,但同时也证明了当时的确有一批学者有严格区分经、史、子、集畛域的思想倾向。

三、刘勰与萧绎的“文笔”说

根据以上叙述,南朝萧梁时期目录学上四部分类法已经基本确立,讨论“文笔”问题,理应规范在集部的范围之内,时人通常是以有韵或无韵来区分文与笔的。那么,有人认为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之说是一种新的文笔观^{②8},就是值得商榷的了。萧绎《金楼子·立言》说: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古人之风也。修天爵以取人爵,获人爵而弃天爵,末俗之风也。古人之风,夫子所以昌言。末俗之风,孟子所以扼腕。然而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笔端而已。至如文者,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②9}

其实萧绎的文笔之分,与刘勰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之说并无矛盾之处。要明白这一点,需要了解在萧绎的时代,经、史、子、集四部的划分已经既成事实,萧绎所谓“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指的是古代的儒者和文士,分解成今之儒、学、文、笔四者。今之“儒”是指“通经的

学者”(承上省略),今之“学”是指博通子、史的学者。那么,他所讨论的“文”与“笔”,仍然可以归纳在集部的范畴之内。“文、笔”合称,才是当时人的集部观念,也就是当时人的文学观念。萧绎讨论“文”的特征时,只是说的“有韵之文”,并未将“无韵之笔”排除在“集部”之外,因此,说萧绎已经有“纯文学”观念,恐怕是不正确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段引文的前面四句话,可见,萧绎其实也是坚持厚古薄今观念,不能认定他已经有所谓先进的纯文学意识。

有人认为,萧绎所说“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是表明他的“文笔”观代表“文笔”论发展的新阶段^⑨。这恐怕也是望文生义的见解,因为贯通上下文来看,萧绎的这句话其实只是对上文所论的一个小结。所谓“古之文笔”即上“古人之学者有二”,就是说古代分为通经的儒士与擅长诗赋的文士。所谓“今之文笔”,即指今人“集部”之学中的“文、笔”而言。由于古代是儒士、文士二分法,今天是经、史、子、集四分法,所以说二者“其源又异”。

再联系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所论来看,刘勰所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就是萧绎所说的“今之文笔”;刘勰所说“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也就是萧绎所说的“古之文笔”。两人所持见解,其实没有大的差别。

王运熙、杨明已经指出:“刘勰、萧绎关于文笔的说法其实基本上是一回事,‘文笔’说也无所谓前期后期,传统革新之别。”^⑩王、杨两学者认为梁元帝所讲的“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系指抒情诗,当亦包括乐府民歌如吴声、西曲之类。他们解释说,这种观点应当也是当时一般人的看法。而此种看法与有韵为“文”的说法并不矛盾,只不过是抒情诗歌视作“文”之中最主要的部分提出来罢了,并无将诗以外的押韵制作如铭、诔、箴等排除在外。按照他们的思路,则萧绎所谓“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所概括的当为抒情诗歌的特征,而非与“笔”相对的“文”的特征。王运熙、杨明的观点,可供参考,但不可忽略的是,萧绎是在“集部”的范围内讨论“文笔”问题,集部中首要的应该是诗赋,萧绎自己曾说:“余好为诗赋及著书,宣修容敕旨曰:‘夫政也者,生民之本也,尔其勸之。’余每留心此处,恒举烛理事,夜分而寝。余六岁能为诗,其后著书之中,惟《玉韬》最善。”^⑪所以,萧绎在这里所讨论的应当是诗赋,而不应当只是指抒情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萧绎不仅指出以诗赋为代表的“文”类作品的三大特征,而且也讨论了“笔”类作品的写作要求,即要求笔类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能够“取义”,即立论正确精当,符合义理、事理,在艺术形式上能够“成篇”,即符合体裁规定,是一篇像样的文章。可见,萧绎对“文、笔”都有所论列,不能仅仅抽出其讨论“有韵之文”的意见,就认定他有“纯文学”的思想。

笔者何以再三强调萧绎是在“集部”的范围内讨论“文笔”问题?这是因为萧绎在记载他自己所著书时,明确地以四部分类,《金楼子》卷五《著书篇》:

《连山》三袭三十卷,《金楼秘诀》一袭二十二卷,《周易义疏》三袭三十卷,《礼杂私记》五袭五十卷

右四件,一百三十二卷,甲部。

《注前汉书》十二袭一百一十五卷,《孝德传》三袭三十卷,《忠臣传》三袭三十卷,《丹阳尹传》一袭十卷,《仙异传》一袭三卷,《黄你自序》一袭三卷,《全德志》一袭一卷,《怀旧志》一袭一卷,《研神记》一袭一卷,《晋仙传》一袭五卷,《繁华传》一袭三卷

右一十一件,二百一十一卷,乙部。

《孝子义疏》一袭十卷,《玉韬》一袭十卷,《贡职图》一袭一卷,《语对》三袭三十卷,《同姓同名录》一袭一卷,《式苑》一袭三卷,《荆南志》一袭二卷,《江州记》一袭三卷,《奇字》二袭二

十卷,《长州苑记》一袤三卷,《玉子诀》一袤三卷,《宝帐仙方》一袤三卷,《食要》一袤十卷,《辩林》二袤二十卷,《药方》一袤十卷,《补阙子》一袤十卷,《谱》一袤十卷,《梦书》一袤十卷
右一十八件,一百六十卷,丙部。
《安成炀王集》一袤四卷,《集》三袤三十卷,《碑集》十袤百卷,《诗英》一袤十卷
右四件,一百四十四卷,丁部。
《内典博要》三袤三十卷
已上六百七十七卷。^③

我们观察萧绎所著书,丁部的《诗英》属于有韵之文,《碑集》属于无韵之笔,而《安成炀王集》和《集》则应当是文与笔兼而有之。从他按照甲、乙、丙、丁四部著录的体例来看,应当是采用晋李充《晋元帝书目》的著录体例。

刘勰与萧绎对“文、笔”的体认,虽然基本一致,没有概念上的不同,但两人对待“文”与“笔”的态度,却有轻重之分。刘勰全面地“论文叙笔”,对“文”、“笔”二体,同等看待,萧绎则流露出“重文轻笔”的思想倾向。他的这一段话:“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笔端而已。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④显然不应当理解为他认识到了“纯文学”的特征,而可以理解为他有“重文轻笔”的倾向。观丘悦《三国典略》所载:“齐魏收以温子升、邢绍不作赋,乃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惟以章表自许,此同儿戏!’”^⑤魏收对温子升、邢绍能笔不能文的批评,与萧绎对阎纂“不便为诗”、伯松“善为章奏”^⑥的批评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重文轻笔”思想的表现。

四、“文笔”之分与唐人的“杂文试”

六朝的“文笔”观念,尤其是“重文轻笔”的思想,对唐人的科举考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考察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杂文”,其实就是“有韵者为文”之“文”。唐人体认的“文、笔”有哪些文体?这在《文镜秘府论》西卷引《文笔式》中说得非常清楚:“制作之道,惟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两句相会,取于谐合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在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⑦在“文”类之中,“诗赋”是具有代表性的文体,在“笔”类之中,“策”是具有代表性的体裁。

唐代科举之进士科,早先只试策。杜佑《通典》云:“自是士族所趣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634),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⑧王定保《唐摭言》云:“进士科与隼、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答策而已……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旧章……后至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680),考功员外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705),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⑨所谓“三场”,即帖经、杂文和策。唐代科举,在贞观八年之前“止试策”,说明当时朝廷只是注重专长“笔”类文体的实用性人才。到神龙元年以后,进士科施行三场考试^⑩,说明朝廷开始注重既有经史功底,又擅长“文笔”的人才。

虽然在考“杂文”之前,举子按例得先通过“帖经”一关,但天宝初年已有“赎帖”的权宜措施,可让文名高而帖经不合格者以试诗补救^⑪,进士科以文学为去取标准已见端倪。杜佑《通典》记载:“天宝元年,明经停《老子》,加习《尔雅》。十一载,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帖既通

而后试文(引者按:“文”当作“诗”)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②看来,终玄宗之世,还是以杂文为次场。不过中唐以后,情况便改观了。例如李观为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其于《帖经日上侍郎书》云:“昨者奉试《明水赋》、《新柳诗》,平生也,实非甚尚。”^③足见杂文考试在帖经之前,而唐末牛希济的《贡士论》亦明言:“天子制策,考其功业辞艺,谓之进士……大率以三场为试,初以词赋,谓之杂文,复对所通经义,终以时务为策目。”^④中唐以后,朝廷索性将进士科“杂文”一场调至“帖经”之前,成为头场把关的要冲,《唐摭言》甚至记载了黎逢、李程因律赋而荣登状元的故事^⑤,正如赵匡《举选议》所说:“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⑥这种状况显示出由六朝发端的“重文轻笔”思想在唐代发酵,愈演愈烈。

五、结论

经过本文的考查和申论,可以得出几点明确的结论:

其一,以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为中心的“文笔”说,建构在中国目录学“集部”发展沿革的背景之下。只有在“集部”的范围内讨论“文笔”文体,才不会枝蔓旁出,莫衷一是。

其二,讨论“文笔”,应当把握“文”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文心雕龙》之“文”与“文笔”之“文”是两个有联系的,但是不能等同的概念。《文心雕龙》之“文”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相当于“集部”的概念,而“文笔”之文,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它只是“集部”之中的“有韵”的文类。同理可知,“笔”字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此,刘师培认为“笔不该文,文可该笔”^⑦,黄侃则认为“文可兼笔,笔亦可兼文”^⑧。其实,周延的表述应该是“广义的文可兼笔,狭义的文不可兼笔”,“广义的笔可兼文,狭义的笔不可兼文”。

其三,刘勰与颜延之对“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体认,并无歧义,颜延之也并无言、文、笔的三分法。颜、刘的不同仅在于,颜延之站在“文士”的立场上,主张讨论“文笔”问题,可以与经典分开,刘勰则站在“宗经”的立场上,认为既然要振叶寻根,讨论“文笔”问题,就不能脱离经典。

其四,刘勰与萧绎对“文笔”概念的体认基本一致,萧绎也是在“集部”的范围内讨论“文笔”问题的,他的“文笔”观并不能视为“文笔”发展的新阶段,也没有所谓“纯文学”的涵义。萧绎与刘勰的不同仅在于他的“文笔”论述,体现出一种“重文轻笔”的思想倾向。

其五,六朝以刘勰为中心的“文笔”说,对唐代科举考试影响颇大。唐代进士考试中的“杂文试”,就是沿袭六朝“有韵为文”的文类标准。唐代进士考试中以“诗赋”为“文”类的代表,以“策”为“笔”类的代表。进士“三场试”的确立,以及“诗赋”考试变为首场和录取与否之关键,反映了“重文轻笔”思想在唐代的发展与深化。

① 冯源:《二十世纪“文笔”说研究述评》,载《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5卷第3期。

②③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第209页。

③ “果”原作“不”,据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7页。

④ “六经”原作“分经”,据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⑤⑩⑪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第266—267页,第274页,第294页。

⑥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301页。

⑦ 《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六《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⑧ 《孔子家语》卷九《正论解第四十一》,《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本。

⑨ 王更生:《魏晋南北朝散文研究的重要意义》,载《许昌师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⑩ 参见《南史·颜延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79页;又见《宋书·颜竣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59页。

页。

- ⑪⑬ 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2 页，第 198 页。
- ⑫ 《昭明文选》卷五七，岳麓书社 2002 年版，第 1706 页。
- ⑬⑭ 《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329 页，第 1778 页。
- ⑯ 转引自郭绍虞等主编《中国历代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24 页。
- ⑰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441 页。
- ⑱ 《史记》，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319 页。
- ⑲⑳ 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四部备要》本。
- ㉑ 《隋书经籍志》单行本，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第 138 页。
- ㉒②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书店 1988 年影印本，卷三《文集》第 86 页，卷一《诗教上》第 19 页。
- ㉔ 《昭明文选》卷五二，中华书局 1977 年影印胡克家刻本。
- ㉖ 张蓓蓓：《认识国学》，台北学生书局 2004 年版，第 228 页。
- ㉗ 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三《勉学》，上海书店 1992 年影印本，第 16 页。
- ㉘ 逯钦立：《说文解字》，《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6 页。
- ㉙③④⑥ 萧绎：《金楼子》卷一《立言篇》，《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㉚ 如傅刚即认为：“萧绎的这一认识对纯文学作品的本质，是把握得很准确的。这样的认识实际上比简单的文笔区分更具有进步意义。”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上编第二章第三节《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㉛ 萧绎：《金楼子》卷六《杂记篇》，《丛书集成初编》本。
- ㉜ 萧绎：《金楼子》卷五《著书篇》，《丛书集成初编》本。
- ㉝ 转引自《太平御览》卷五八七，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
- ㉞ 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74 页。
- ㉟④② 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中华书局 1984 年影印本。
- ㊱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试杂文》，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 ㊲ 陈飞认为，《唐摭言》所云神龙元年行三场试的说法不够准确，开元二十五年（737）的《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才是唐代进士科“三项试”制度确立的法令标志。见《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载《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 ㊳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贖帖’。”《丛书集成初编》本。
- ㊴④④ 《全唐文》卷五三三，卷八四六，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 ㊵ 参见王定保《唐摭言》卷五“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条。
- ㊶ 《全唐文》卷三五五。参见简宗梧、游适宏《律赋在唐代“典律化”之考察》，载《逢甲人文社会学报》2000 年第 1 期。
- ㊷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引自陈引池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3 页。

（作者单位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责任编辑 山木